

# 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与许地山的回应

周 伟 薇<sup>1 2</sup>

(1.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2.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20世纪20年代,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许多文化精英和社会团体都厕身其间。在运动伊始,许地山分别做了《宗教的生长与灭亡》(1922)、《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1923)的演讲,直接回应了非基督教运动,并参与了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为中华教会这一基督教本色化过程。在运动高潮期,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许地山撰写《反基督教的中国》(1927),考察中国反基督教的原因和过程,检审中国的文化历史心理结构。在举国伐耶的时代,许地山保持了独立的思考,坚持神圣超越价值的追求。

**关键词:**许地山;非基督教运动;民族主义;1920年代

**中图分类号:**K26;D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7)06-0167-06

1922年,中国爆发了一场持续数年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的本意是提倡科学精神、反对迷信,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但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在这场对外来宗教的抵制运动中,过于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难免会淹没来自理性层面的冷静思考。

在非基督教运动伊始,许地山分别做了《宗教的生长与灭亡》(1922)、《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1923)的演讲,对如火如荼的非基督教运动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更倾向于客观冷静地就宗教问题本身的发展、性质、功能和价值做出辨析。在非基督教运动的高潮期,许地山又撰写了《反基督教的中国》(1927),考察中国反基督教的原因和过程。许地山这些演讲与文章检审了中国的文化历史心理结构,甄别了宗教与迷信之畛域,考量了科学、人道与基督教的兼容性。许地山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显得不合时宜,也没有产生特别的反响,但是穿过历史的迷雾,今天我们再回头审视他的言论,也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

## 一、非基督教运动爆发与许地山的前期回应

20世纪初,中国成为海外传教的重点区域之一,约有三分之一的海外传教志愿学生进入中国传教,他们大部分具有神学素养并经过专业技术训练。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国人对西学发生了强烈兴趣,民国宪法规定并保护信仰自由,这些有利因素使基督教在教育、医疗、慈善、文化等领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信徒人数特别是学生信徒人数骤增。因此,1900—1920年被称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黄金时代”。

1922年春,两个因素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其一是《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以英汉两种文字出版,该书包含的征服意味及其提供的详细图表和数据刺激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中国知识界;其二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将于1922年4月在清华大学召开。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基督和世界改造”,对“一战”的反思成为会议重点。这也是“一战”后首次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意义重大。但也有部分中国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这“无非是些怎样维持世界资本主义及怎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把戏”,将该会看作是“侮辱我们青年、欺骗中国人民、掠夺中国

收稿日期:2017-01-10;修订日期:2017-03-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作家对基督教的接受研究”(12YJCZH313)

作者简介:周伟薇(1979—),女,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宗教学、文艺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经济的强盗会议”<sup>[1]</sup>。1922年2月26日,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成员为主的青年学生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北京首先呼应,北京大学学生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该同盟宣言由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撰写,共有79人在其上签名。1922年3月21日宣言发表,其中写道:

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人类本是进化的,宗教偏说人与万物,天造地设。人类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人类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异党同,引起战争,反以博爱为假面具骗人。人类本是好生乐善的,宗教偏偏诱之以天堂,惧之以地狱,利用非人的威权道德。……好笑的宗教,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

中国在上世界上比较起来是一片净土,算无宗教之国。无奈近数十年来,基督教等一天一天的向中国注射传染。……回想我们人类所受过基督教的毒害,比其他诸教都重大些<sup>[2]</sup>。

这段宣言的要点可以归结为:(1)宗教违背人道主义,宗教对人类有大毒害,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2)宗教与人类进化的观点是对立的,宗教与科学真理不容;(3)宗教是威权的、迷信的,宗教妨碍人的自由平等,摧残个性;(4)宗教党同伐异,挑起战争;(5)基督教危害最为严重。

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戴季陶等民国要员,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张闻天等早期共产党重要成员,余家菊、王星拱、沈雁冰等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以及高一涵、缪凤林等社会名流都曾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场运动。在这些文化名流和党政要员的巨大号召力之下,各地学生也纷纷响应,北京、太原、武昌、福州、厦门、汕头等地师生都开始组织非宗教同盟声讨基督教。值得注意的是,同中国历史上义和团等农民运动相比,非基运动初

期剔除了暴力手段,以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相号召,基本上采用的是笔战与游行形式,以思想层面的交锋取代了身体上的对抗。

与此相对,知识界也有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研究系人物对狂热的非基督教运动提出反对意见。1922年3月21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周作人、钱玄同等五位北京大学教授发表了《主张信仰自由宣言》,指出个人信仰应有绝对自由,对非基督教运动表示明确反对。常乃德、梁启超、张东荪、屠孝实等教外人士也对非基督教运动进行了批评。但这些理性的声音在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并不多见。

在非基运动第一阶段,教会方面的回应态度各不相同,基要派或对非基运动不予理会,或展开激烈的批判。例如,张亦镜主笔的《真光杂志》就针锋相对、措辞犀利,但对教会自身存在的问题却缺少反思;自由派刘廷芳、赵紫宸、简又文、徐庆誉等人对非基运动的态度更为理性开明,他们对非基言论进行认真研究,由此反思教会的种种不足,提出改革意见,尝试建立一个中国化的、不被国人排斥的基督教。自由派甚至肯定了非基运动对于宗教问题的暴露及其对教徒的警醒作用。

许地山作为燕京大学代表参加了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非基督教运动发起之时,许地山一方面发表演讲并刊发于有影响力的刊物;另一方面继续参与教会改革,促进教会的本土化过程。例如,许地山曾受邀出席上海星期讲演会,以一位宗教研究者的公正态度,阐明自己对宗教的看法,对多种宗教生长与灭亡的过程及其原因做出详细的描述与澄明。随后讲稿刊发在1922年5月25日的《东方杂志》第19卷第10期上。

第一,针对非基运动将宗教视为迷信及“好笑的宗教,科学真理,既不相容”的观点,许地山以很长的篇幅描述了宗教从“巫术”到“巫术宗教”再到“高等宗教”的发展过程,将“巫术”“迷信”与“宗教”区别开来。许地山认为西方四种科学真理的发现对宗教的影响最大:一是经由哥白尼“日心说”的发现,宗教思想中对“神”“天堂”“地狱”“祈祷”的界定已经大大改变;二是由于达尔文《种源论》的问世,基督教义中对于“人性”

“救赎”“堕落”“生”“死”的含义开始寻求新的理解;因为印度的《梨俱吠陀》等宗教典籍的发现,欧洲改变了对《圣经》的态度;经过地球年龄的发现,西方开始了对教义经典内容的怀疑。许地山认为,正是科学真理的发现使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又有了一片新的天地,宗教与科学是相容的。他在一年后所做的《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1923)的演讲中,再一次对科学与宗教的兼容性问题做出了阐释:“或谓宗教与科学不并立,其实不对。科学对于物质的世界,有正确的解释,能与吾人以正确的智识。此正确的智识,正为宗教所需要。必先有正确的智识,然后有正确的信仰。所以宗教,必须容纳科学,且要有科学的精神。”<sup>[314]</sup>

第二,针对非基督教运动以人道主义立场反对宗教(“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许地山指出“凡一种思想或行为够得上成为宗教的当要:(一)在人间为精神调和物质的运动;(二)以信仰创造具足的生活。……宗教乃人类对于生活一切思维,一切造作,所持或显示底正当态度。”<sup>[4]29-31</sup>针对宣言中“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的观点,他指出现存的进化为高等人文教的七大宗教都具有“清洁”“谦卑”“利他”“公正”“热望”“和平”六个特点。既然现存宗教具有这六大美德,显然不是违背人道主义的。

第三,面对“人类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异党同,引起战争”的责难,许地山对多种宗教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提出各种宗教在道德指向上往往是相通的,且宗教之间抬高自己压低别人的现象正在逐渐减弱。

1923年,许地山作了题为《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的演讲,刊发在1923年4月14日的《晨报》副刊及1923年5月的《生命月刊》第3卷第9期上。文章思考了如下问题:(1)宗教是不是普遍的需要;(2)宗教的领域;(3)中国现代缺乏的宗教精神;(4)中国今日需要什么样的宗教。直接或间接地回答了“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好笑的宗教,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博爱为假面具骗人”“我们人类所受过基督教的毒害,比其他诸教都重大些”等问题。在文章中,许地山对非基督

教运动并不是简单的驳斥,而是融合了吸纳、反思与驳斥等多种向度的思考与回应。可以说,正是非基督教运动促发了许地山对“中国需要什么样宗教”问题的思考。

首先,与“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的观点相反,作为基督教信仰者的许地山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提出了宗教是人类的精神需要。现实生活的缺失与对人生目标的寻求,遂使人们生出改造现实、臻于至境的理想,并表现在行动上:(1)凡宗教必有一特别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人类所欲达到,而为人间生活所必要有的;(2)凡宗教全要想解决‘人生目的’的问题;(3)凡在宗教团体的人,必用自己的宗教理想,表现于实行上;(4)凡宗教必不满足于现实生活……(5)凡宗教皆栽培、节制、完成人类的欲望。”<sup>[31]</sup>许地山认为宗教节制人的“肉欲”,修剪栽培人的“我欲”,发展强健人创造世界能力的“意欲”。所以宗教的领域是巨大的,“宗教的本体,是人生普遍的需要”<sup>[31]</sup>。

其次,虽然宗教的领域是广泛的,对宗教的需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许地山没有回避当时中国缺乏宗教精神这一问题。非基督教运动对宗教的批评促使许地山对中国宗教现状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又在某种程度上反驳了《非宗教大同盟宣言》所宣称的“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比较起来是一片净土,算无宗教之国”的观点。许地山以通过对中国佛、道诸教的考察及其与西方耶稣教的比较,发现中国宗教具有五大缺点:(1)佛经翻译中的梵音直译与梵文伪造有意造成玄妙难解,“多注重难思的妙法,而轻看易行的要道”<sup>[312]</sup>;(2)修道人不注意传播与发展的事“轻看群众的受持”<sup>[313]</sup>;(3)“重视来世的祸福,而忘却现实之受用,与享乐”<sup>[313]</sup>;(4)“只见宗教柔弱方面,而忽略了宗教的刚强方面”<sup>[313]</sup>;(5)认为宗教只是在屋中燃香、默坐、入定、持斋,而不去建养老院、孤儿院,做慈善之业<sup>[313]</sup>。可以说,在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之下,这些观察与评价是切中时弊、深中肯綮的。

以上诸论历数中国宗教五大缺点,那么今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宗教呢?许地山认为,中国自古礼教多有流弊,传入的佛耶两教又不符合中国

人的特性,所以“今日所需的宗教必要合于中国现在生活的需要”<sup>[3]4</sup>。许地山结合自己在基督教教会的体验与观察,提出了中国所需要的宗教是:(1)易行的、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做成的善业;(2)不为特定的人而是群众可以修习的;(3)要道德情操很强的;(4)要有科学精神的;(5)要富有感情的;(6)要有世界性质的;(7)必注重生活的;(8)要合于情理的。他与梁启超、高一涵等人的观点一样,认为“我们指出现有的一个宗教而说她是适合中国现在生活的需要是很难的。按耶教近年发展的趋向似甚合于上述的理论。……凡不背上述条件的宗教就是我们中国今日所需要的宗教”<sup>[3]4</sup>。

在非基督教运动蓬勃发展之时,许地山还切实地投入到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的本色化进程中。他与易文思、宝广林、老舍等人共同制宪、起草总纲章程规约,将“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易名为“北京瓦缸市中华基督教会”,由中华基督教联合机关进行管理,规定负担经费的信徒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力,筹议在组织、会议、经费、入教、惩戒、礼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力图实现教会自立、自理。同时通过扩充英文夜校、广筹捐额等措施增加教会经济收入,实行教会经济独立,“尽力使天国的愿望实现于人类社会”,使教会朝着自立、自养、自理的本色化方向行进。此外,还向西人学习传教方式,计划罗致社会人才,拟设医院、平民学校、公共阅书报所、妇女工厂、劳工救济、灾害赈施等,尽力使教会成为社会中心<sup>[5]</sup>。

马克思曾经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此,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当时的中国留下了众多的骂名。与此相比,许地山在回应非基督教时并不狂热、激烈,而是平和、大度、理性的,其言行体现出的正是简又文所呼唤的“进化的见解,历史的眼光,时代的观念……诚实的、敬人的、同情的、温和的”<sup>[6]5</sup>态度和“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sup>[6]5</sup>的理智与宽容。而能保持此种态度和冷静立场乃是缘于许地山对宗教问题的敏锐直觉和精深研究以及一贯的开放与宽容的态度。

从许地山的文章、起草议案和教会改革措施来看,他对宗教的观点和标准显然有着强烈的现

世关怀与社会改造热情。从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自由神学与社会福音派思想对许地山的影响。与旧神学相比,自由神学与社会福音派神学更为开放、容忍,“一方面以批判眼光和科学精神来研究《圣经》,重新检讨传统教义;另一方面是对当代潮流文化的回应和适应”<sup>[7]</sup>。欧美自由神学与社会福音派神学对时代的回应及对自身的强烈反思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简又文、赵紫宸、刘廷芳等中国基督教界人士,就已经意识到宗教对时代回应之必要性,认为基督教应该回应“民主”“科学”“救国”等时代呼召。许地山与赵紫宸、刘廷芳、简又文、徐庆誉、司徒雷登等基督徒一样,否认基督教是“他世主义”“只传个人的福音”等“非基”言论,坚信基督教对当时的中国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 二、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与许地山的后期回应

1925年“五卅运动”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达到极致,形成了罢工、罢市、罢课高潮,帝国主义接连制造了“汉口惨案”(1925年6月11日)、“沙基惨案”(1925年6月23日)、“重庆惨案”(1925年7月2日)。1925年6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宣言,指责屠杀中国学生与市民的英国巡捕,并质疑英国人既然信奉基督教,何以做出如此残暴行为?由此将“五卅运动”与基督教联系起来。

“五卅运动”之前,已经有人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但在非基运动初期,连一些反教人士也认为此种说法过于偏激。但随着系列惨案的发生,人们不禁质疑为何信奉基督教的英帝国主义行径如此野蛮?而后,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先锋的观点被反教人士普遍接受,一些基督徒也强烈表达了对英帝国主义的抗议,非基运动高潮由此被点燃。1925年7月7日,全国学联第七次大会在上海召开,明确将反对基督教确定为反帝战线之必要部分,将圣诞节前后一周定为“反基督教周”,并决定采取多种手段反对基督教,标志着非基督教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曾一度解散的非基督教同盟此时也纷纷恢复,北京、广东、福建、湖南等地的学生、工人、商人响应反帝号召,

进行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反基督教运动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有研究者指出,帝国主义与基督教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基督教传播的使命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殖民意图当然有所不同。在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上,固然有像郭实腊这样在列强侵华过程中充当情报收集开路先锋的传教士,但像裨治文、戴德生、丁慧良、李提摩太、伯格理这样致力于传播教义的传教士也并不少见。一概抹杀基督教会及教界人在中国的近现代过程中,尤其是在出版印刷、教育、医学等领域做出的贡献,既有失公允,也非尊重历史的态度。

1927年,许地山归国。在非基督教运动后期,民族主义成为主导思想,基督教被视为“夷狄邪说”“帝国主义的先锋队”“资本家的走狗”,社会各阶层群情激愤,甚至出现了暴力事件。面对日益激化的矛盾,许地山应生命社的邀请,对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历史做了一番梳理,撰写了《反基督教的中国》一文并连载于《真理与生命》杂志上,既表达了对非基运动的理解与赞同,又指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

在《反基督教的中国》(1927年)中,许地山考察了中国近代政府与社会各阶层对基督教的种种排斥行为,试图从历史中寻绎出中国反对基督教之漫长过程与复杂原因,并借此检省中国的历史文化心理结构。在许地山看来,“近来反基督教运动几乎弥漫全国……今日一般人对于基督教底误解,其由来并非一朝一夕之故”<sup>[8]16-17</sup>,“其实帝国的侵略政策未在中国发展以前,国人反对基督教底思潮早已达到极点”<sup>[8]17</sup>。许地山相信时间终会洗刷一些历史谣言,也赋予历史一种清洁的能力,从而为现实提供某种反思与借鉴。

第一,考察了清政府特别是总理衙门对于基督教的态度。许地山整理摘录了同治十年总理衙门致各国大臣书并附商办传教章程公文。公文曰:(1)基督教的慈善事业组成部分的育婴堂是对中国事务的搀越,引起了民间诸多猜疑,要求一概收归中国各省办理;(2)基督教男女同处一堂崇拜,侵犯了中国的礼俗规矩,要求中国妇女不得入堂,外国女传教士不得在中国传教;(3)传教士

在中国当需有执照,收入入教要考察信徒的品行,传教士在中国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sup>[9]</sup>。许地山指出这些章程是政府的一种策略性托词,清朝屡次被洋人打败,虽然定约允许传教,但心中又有忌惮,所以纵容官绅诋毁基督教或提倡本国的风俗来做文化的抵制。

第二,考察了中国士人阶层对基督教的态度。许地山整理摘录了晚清名士蒋敦复、张自牧、杨象济等人的言论,如蒋敦复《致英国使臣威妥玛书》云“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一日不绝,西国之教一日不行。”<sup>[10]161</sup>张自牧认为“耶稣天主之教传入中国,好事者指为巫蛊魑魅,及采生折割诸妖术……”<sup>[11]188</sup>杨象济指出的洋教所言不合科学等。许地山总结指出“我们可以归纳当时比较有知识的读书人,对于基督教底意见。简单地说,第一点是基督教底道理荒诞不足信;第二基督教所谓仁爱,充其量亦不过是墨氏之爱,及宋襄之仁;第三是基督教所传违反了孔孟底教义,如男女混杂及长幼无序之类是。”<sup>[11]190</sup>“教徒中对于国家底观念颇不一致,但反对教会底人,不分青红皂白,总以为他们是违背中国底奸细或犯法底罪人”。认为这些结论“并不是从观察教徒底信仰或教义底内容而来,乃是从争讼中得来”<sup>[11]190</sup>。当然,这亦是许地山的一家之论。

第三,考察了光绪、同治年间的教案。许地山辑录了十几起教案:如光绪二十三年,山东胶州德教士被百姓杀害;光绪六年,美国传教士鲁聘儒因为医治教外妇人,而被人怀疑为引诱行为,教堂器物被捣毁;同治九年,天津民众以为教堂挖人眼睛心肝做药,各处教堂被毁,多位教士被杀;同治八年,扬州民众闯入教堂打人,戴德生家人逃命跳窗受伤;同治元年,湖南、江西盛传天主教以宣讲为名,奸淫妇女,采取红丸,两省各地掀起反教运动,酿成“江楚教案”等。许地山特别指出这些是案情特别及重要的,而小教案几乎各省年年都有。其原因是中外在缔结和约之前,“基督教被视为邪教,与白莲天理等教同类,教民被屈,亦无处申诉,及至约定后教民复借外人势力,对于教外人施行报复及欺凌行为亦所不免”<sup>[11]194</sup>。

第四,考察了基督教被当做邪教的原因。许

地山认为中国民众的仇教情绪主要是因为中国文人学士的抵制。许地山痛斥这些士人不用心探究事物真理,反而津津乐道于道听途说的行为。他辑录了《天主邪教集说》中极尽淫荡、邪奇之想象以及集巫术、邪术、蛊术、幻术、房中术为一身的天主邪教之荒诞描述。例如“神父多在童时受教,割去肾子,曰,‘弥赛’。从其教者,与神父鸡奸不忌,曰‘益慧’”“老幼男女齐集天主堂……诵经,事毕,互相奸淫以尽欢,曰‘大公’,又曰‘仁会’”“且新妇必先令与所师教主宿,曰‘圣掬罗福’。”<sup>[12]224</sup>“有所贪者,即能以符咒迷之,使之欣然入教。”<sup>[12]225</sup>“及凡欲入天主教,不问男女,主教者必先为沐浴,曰‘净体’。盖借此行其奸汗,以后惟其所悦。”<sup>[12]225</sup>许地山认为文人学士对基督教有四种成见,也许一些论述与事实并不相符。

许地山在非基运动的高潮期,遍考清朝从雍正降谕废逐天主教至清末鸦片战争各时期的排教现象,显然是对非基运动充满忧虑的。他担心非基督教运动走向义和团运动那样的血腥暴力:“今日为有知之徒(新名词叫智识阶级)底义和团而已。今日的反基督教者,对于基督教义并未有何等了解,对于基督教底强处攻之不已,至于基督教底弱点反而无所表示。这未能深底一个宗教底精神所在而谬加反对底便是义和团精神。如这样的态度不变,非再演成第二次底义和团变乱不可。”<sup>[8]17</sup>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许地山对中国反基督教

历史的回顾意在对中国当时的困局寻求解决之道。在他看来,尽管非基督教运动用了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新理论,却与近代教案中“崇正黜邪”“尊王攘夷”等不同,包含着一种偏执的民族主义情绪;看似反帝国主义的理性山峰,其基座却是一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感。

#### 参考文献:

- [1]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N].先驱,1922-03-15.
- [2] 唐晓峰,王帅.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535-536.
- [3] 许地山.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J].生命,1923,3(9).
- [4] 许地山.宗教的生长与灭亡[J].东方杂志,1922,19(10).
- [5] 老舍.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J].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4,(7).
- [6] 简又文.非宗教运动与新教育[J].青年进步,1922,(54).
- [7] 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1900—1949)[M].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107.
- [8] 许地山.反基督教的中国[J].真理与生命,1927,2(1).
- [9] 许地山.反基督教的中国[J].真理与生命,1927,2(5):127-130.
- [10] 许地山.反基督教的中国[J].真理与生命,1927,2(6).
- [11] 许地山.反基督教的中国[J].真理与生命,1927,2(7).
- [12] 许地山.反基督教的中国[J].真理与生命,1927,2(8).

[责任编辑:那晓波]